

2026.5.27 星期三
责编:张茜楠 朱希杰 版式:冯梅花 电话:(029)81140213 csjrbll@163.com

经济体制改革的为主线: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转变、突破与创新

经济体制改革始终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主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关键在于我们兼顾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二十届三中全会是三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会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序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三次会议持续优化政府与市场权责关系,推动二者历经理念转变、理论突破与制度创新。

一、为何要变:政府与市场关系改革的三重逻辑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借鉴苏联模式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但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以行政命令为主、排斥市场机制的体制弊端逐步凸显,经济运行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其根源在于政府过度管控经济运行,忽视市场机制调节作用。历史实践充分证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命题。

从理论层面来看,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科学界定政府与市场关系筑牢了根本理论根基。1979年,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实行市场经济;^[2]1982年,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具备“全国一盘棋”的发展优势,短板在于市场运用不足、经济活力偏弱,必须切实解决好计划与市场的统筹协调问题。^[3]在其理论体系中,

计划与市场各有所长、各有短板,二者有机融合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力。

从实践层面来看,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多重现实考验。步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转变,加之国际发展环境日趋复杂多变,亟需从更高层次统筹协调政府与市场定位。市场调节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固有局限,放任市场自由发展极易引发收入分配失衡、行业垄断滋生、区域发展差距拉大等问题。与此同时,部分政府部门存在职能越位、错位、缺位现象,不当行政干预扰乱正常市场秩序。^[4]“现实发展需求,倒逼我国持续优化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

二、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破除计划与市场对立传统观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彻底排斥市场要素,难以精准把握市场供需动态变化,无法实现社会资源科学高效配置,严重束缚生产力解放与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变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并对经济管理体制加以改革。因此,计划和市场能否结合以及如何结合成为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核心问题。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从三大维度推进经济领域改革:一是下放管理权限,破解权力过度集中难题,赋予地方与企业更多经营管理自主权;二是优化经济管理模式,全面推行经营责任制;三是调整完善经济发展政策,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

富起来,发挥示范带动作用。^[5]

此次会议正式文件虽未明确提及“市场经济”相关表述,但会议推出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举措,彻底打破“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的思想桎梏,破除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互对立的陈旧认知,为后续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坚实思想基础。

三、突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实现市场作用定位重大升级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部署,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本质上是厘清资源配置由市场主导还是由政府主导的根本性问题。^[6]厘清这一核心变革,关键在于区分市场“基础性作用”与“决定性作用”。以往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遵循国家调控市场、市场调配资源的运行逻辑,市场调节依附于政府宏观调控;而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主导地位。在此框架之下,政府不再直接干预微观市场经营活动,重点做好价格、就业、利率等宏观经济指标调控,仅在失业率、通胀率偏离合理运行区间时实施精准调控,清晰划定政府治理与市场运行的权责边界。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突破,这一转变表明国家对于市场规律的理解和调控能力在不断进步。

四、创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谋划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正式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战略任务。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集中体现在制度体系成熟定型、政企协同关系高效顺畅、对外开放层次持续提升三大方面。该体制坚守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统一,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发展目标上实现辩证平衡,推动政府与市场在动态调整中相互支撑、协同共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要义始终是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体制机制革新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在体制构建实践中,宏观层面不断完善适配新质生产力培育、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

深度融合的科技、财税、金融等配套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细化国有资本、民营企业市场准入、行业监管、发展评价相关标准,健全产权保护、统一市场准入、惩罚性赔偿等基础性市场经济制度。^[7]由此可见,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有为政府治理效能深度融合的全新实践形态。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进程中,三次关键会议层层递进,推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成熟,也促成政府与市场关系实现转变、突破与创新。历经长期改革实践,我国对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与驾驭能力不断提升,现代化宏观调控体系日趋健全完善,持续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体制动能。^[8]

作者:刘玉静(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 [1]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激发全社会内动力和创新活力[N].人民日报,2024,(09).
-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何树平,刘凯瑞.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新定位、新要求——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论述[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01):13-19.

-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 [6]《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 [7]《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 [8]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数字经济时代民营企业如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经济模式正被深刻重塑。民营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创新、吸纳就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数字经济带来的高灵活性、高技术性和多样化用工形式,也给民营企业的劳动关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新形势下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一、数字经济时代民营企业的角色与劳动关系演进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形态。与传统经济相比,数字经济具有数据要素化、生产组织平台化、技术深度融合、催生新业态、治理模式多元等特点。这些变化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对劳动关系的稳定性和公平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民营企业在数字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统计数据显示,民营企业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70%以上的科技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尤其在数字经济市场主体中,民营企业占比高达94%,是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主力军。但与此同时,民营企业也存在业态单一、管理效率低、融资困难、劳资纠纷频发等问题。数字化转型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已成为其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我国从计划经济时

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再到2006年首次提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经过几十年的探索,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这种劳动关系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障,立足企业与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定位,坚持互利共赢、共建共享原则,形成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格局。

二、民营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面临的挑战

尽管政策环境不断优化,但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民营企业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方面仍面临以下几方面挑战:

(一)法律法规与监管手段滞后

现行劳动法律法规大多基于传统经济模式设计,难以适应灵活就业、平台经济、远程办公等新业态。例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型劳动者的劳动关系认定缺乏明确法律依据,导致权益保障难。政府虽然出台了鼓励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但针对劳动关系和谐发展的具体措施仍然不足。同时,监管手段滞后,部分企业缺乏有效外部约束,违规行为难以被及时发现和制止。

(二)劳动关系认定困难

新业态形态具有高灵活性、自主性强、身份多重等特点,给劳动关系认定带来两大难题。一是用工形式多样,平台企业往往不与劳动者建立直接雇佣关系,导致传统认定标准不再适用;二是从属性判断模糊,劳动

者在人身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方面表现不一,有时可为多个平台工作,使得劳动关系难以厘清。

(三)员工权益保障不足

由于劳动关系认定困难,许多新业态劳动者无法享有完整的社会保障。调查显示,仅37.7%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参保率刚过半数,生育保险、失业保险整体覆盖率更低。部分中小企业因经营压力或法律意识淡薄,存在不缴或少缴社保的情况。此外,劳动报酬不稳定、收入与派单量挂钩、加班费难以落实、工作与生活动边界模糊等问题普遍存在。快递员、外卖骑手等群体面临的交通安全风险也未得到充分重视。

(四)内部管理与协调机制复杂

数字经济下,用工模式多样,企业如何制定公平合理的管理制度、协调部门关系、激励员工,成为新的难题。信息不对称和利益诉求差异导致企业与员工之间信任缺失:企业掌握更多信息而员工了解有限,容易产生不信任;企业追求利润,员工关注权益保障和个人发展,双方诉求不一致,增加管理难度。此外,算法歧视、数据监控、情感异化等新型争议问题缺乏明确法律规制,给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和诉讼带来挑战。

三、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对策建议

针对上述挑战,民营企业应从法律、机制、管理、协同等方面入手,积极探索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的有效路径。

(一)完善法律法规,加强监管力度

一方面,要加快修订和完善劳动法律法规,增加针对新就业形态的专门条款,明确工伤认定标准、社保缴纳比例、休息休假制度等,细化从属性要素,为劳动关系认定提供清晰依据。另一方面,政府应建设数字化监管平台,利用大数据实时监测企业用工行为,及时发现和处理违法违规问题。同时,加强政府、工会、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协同监管,形成监管合力,避免劳动者在多个部门之间反复奔走。

(二)强化员工权益保障机制

保障员工权益应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建立稳定的劳动报酬制度。合理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并定期调整,确保基本生活。严格执行加班费支付标准,按时足额发放工资,明确工时或计酬标准,严禁拖欠和克扣。二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当前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参保人数仍有较大缺口,应尽快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社保体系,探索适合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模式,取消户籍限制,完善社保转移接续政策。三是加强职业安全健康保护。要求企业提供必要的安全培训和防护设备,定期组织体检,增强企业责任意识,预防事故发生。

(三)创新企业管理模式与方法

企业应探索建立适应数字经济新型劳动关系管理模式。一是推广弹性工作制,不局

限于弹性工时,还可扩展到工作地点、工作任务等方面,提升员工幸福感和劳动效率。二是深耕企业文化建设,依托各类团建活动凝聚团队向心力,切实提升员工归属感与认同感。三是依托科技手段实现多元化绩效考核,综合评估协作能力、沟通能力、创新能力和客户满意度,并据此调整薪酬与晋升。四是畅通内部沟通渠道,依托座谈交流、意见征集等形式开展集体协商,拉近劳资距离,化解矛盾分歧。

(四)构建多元协同共治模式

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需要政府、企业、劳动者、行业协会和社会组织等多方共同参与。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完善法规、加强监管,严厉打击违法行为;企业要自觉守法,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健全内部管理,保障员工权益;劳动者应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了解自身权益,积极参与企业管理;行业协会应发挥桥梁作用,加强行业自律,提升争议处理能力;社会舆论应加强监督引导,曝光违法行为,宣传优秀企业文化,鼓励公众举报投诉,形成全社会关心和维护劳动关系的良好氛围。

四、结语

总之,数字经济时代民营企业劳动关系呈现复杂化、灵活化特征。需要通过完善新型用工法规、创新企业管理模式、搭建社会组织多元调解机制、打通多方信息共享渠道等多方协同发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与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实现双向共赢。

作者:于小淇(吉林大学)

互联网金融消费法律风险研究

互联网金融消费依托数字技术打破了传统金融的时空限制,凭借低门槛、高效率、普惠性强的特点,广泛渗透居民消费领域,成为拉动内需、激活市场活力的重要新业态。但行业快速扩张的同时,各类金融乱象与法律风险持续暴露,传统金融监管制度难以适配数字化金融模式,法律规则滞后、行业乱象频发、消费者权益受损等问题凸显,完善互联网金融风险治理的法律制度,是规范行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相较于传统金融,互联网金融行

生出多重新型法律风险。其一,为信用违约风险,多数线上信贷审核依托大数据快速授信,风控标准宽松,对借款人还款能力核查不足。加之超前消费观念盛行,部分借款人存在多头借贷、以贷养贷等行为,极易引发大规模逾期违约,滋生个人债务危机,潜藏行业区域性、群体性风险,累积或将引发行行业系统性隐患。其二,是违规经营风险,不少平台为规避利率监管,以服务费、担保费、管理费名义拆分收费,变相突破法定利率上限,设置隐性高利贷,违背金融合规经营原则与利率监管底线,直接侵害消费

者财产权益。

当前我国互联网金融的法律规制体系仍存在明显短板。目前行业监管多依赖低位阶的部门规章,缺乏统一、专门的高位阶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仅作出原则性规定,针对助贷合作、算法风控、线上催收等新业态缺乏细化规制规则,司法与监管层面法律适用标准模糊。同时,监管体系存在多头监管与监管空白并存的问题,不同类型金融主体监管标准不一,存在较大监管套利空间。此外,金融消费者处于弱势

地位,电子证据易篡改、举证难度大,加之平台不合理格式条款的限制,导致消费者维权成本高、救济渠道不畅。

化解互联网金融消费法律风险,需要构建立法、监管、司法协同发力的治理体系。立法层面,应完善专项法律规范,明确行业准入标准、利率红线与收费规范,严厉打击隐性高利贷等违规行为,细化个人信息收集、使用、存储的法定边界,压实平台的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主体责任;监管层面,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依托大数据实现动态智能化监管,重点整治违规授信、变相

收费、暴力催收等乱象,加大违法惩戒力度;司法层面,统一金融纠纷裁判标准,否定不合理格式条款效力,优化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对弱势金融消费者权益予以倾斜性司法保护。

总而言之,只有依托法治手段补齐制度短板、规范行业经营秩序、健全权益保护机制,才能平衡金融创新与风险防控的关系,引导互联网金融回归合规普惠本源,实现行业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

作者:王嘉楠(西安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大型精装修工程项目管理要素

摘要:大型精装修工程项目具备规模大、工序复杂、质量标准高、参与决策主体多元等特点,项目管理工作以“计划、质量、进度、成本、合同、风险”六大要素为基本框架,以技术路径、设计管理为重要支撑,构建系统化、规范化、全方位、全流程的管控体系。

大型精装修工程项目参与各方涵盖建设、施工、监理、设计、材料供应等多方单位,管控难度较高。立足项目特性,分层搭建以六大核心要素为主体、技术路径与设计管理为支撑的管控体系,是保证项目按期、保质、控本完成、达成预期目标的根本手段。其中,设计管理是项目品质的源头管控核心,直接决定项目整体呈现效果,使用功能落地及施工推进效率,是项目管理体系中不可替代的核心要素。

一、计划管控:项目推进的总纲领

计划管控是大型精装修工程项目管理的首要环节,贯穿项目全生命周期,是其他

各项要素管控工作的基础与依据,其核心思路可凝练为“统筹规划、动态调整、落地执行”。具体来看,需结合项目总体目标、定位标准及现有资源条件,编制完善的项目总体规划,明确立项、设计、施工、验收、交付全流程的核心任务、关键节点、资源配置与责任分工,保障各环节有序衔接、高效推进。同时,基于总体规划细化部分分项工程专项计划,建立常态化计划动态调整机制。

二、质量管控:项目的核心生命线

工程质量是大型精装修项目的核心生命线,直接决定项目使用功能、视觉呈现、使用寿命及项目口碑,需严格遵循“事前预防、事中控、事后复盘”的全流程管控原则,全面排查、杜绝各类质量隐患。

三、进度管控:确保项目按期交付

大型精装修工程工序繁杂、多工种交叉作业频繁,且易受各类外部因素干扰。进度管控以“科学计划、过程严控、预警纠偏”为核

心,可有效规避工期延误引发的违约风险与成本增量。

四、成本管控:实现效益最大化

大型精装修工程项目投资体量较大,成本构成繁杂,覆盖材料采购、人工薪酬、设备租赁、项目管理、工程变更等多项费用。成本管控严格遵循“事前预算、事中管控、事后核算”的原则,严控资源浪费,防范项目成本超支风险,最大化提升项目投资效益。

五、合同管控:规范各方权利义务

大型精装修工程项目参与主体多元、各方利益关系复杂,合同管控是规范合作主体行为、规避合作纠纷、保障项目平稳推进的核心手段,需全面强化合同签订、履约执行、变更调整、竣工结算的全流程闭环管理。

六、风险管控:识别项目潜在隐患

大型精装修工程项目建设周期长,覆盖范围广,存在质量、进度、成本、安全、合同等多维度潜在风险。风险管控以“提前识别、

科学评估、有效应对”为核心,最大限度降低风险损耗,保障项目平稳落地实施。

七、技术路径:项目管控的重要支撑

技术路径是大型精装修工程项目管理的重要支撑要素,从项目设计阶段起始,贯穿施工、验收全流程,为六大核心管控要素的落地实施提供实质性技术保障,其核心要义可概括为“科学选型、规范实施、优化提升”。在实操过程中,需立足项目定位与设计标准,确定科学合理的技术路径,确保施工工艺选型、材料应用技术、智能化系统集成技术等,全面适配项目质量标准与进度要求。

八、设计管理:项目品质的源头把控

设计管理是大型精装修工程项目最核心、最根本的支撑要素,贯穿项目设计全流程,直接决定项目整体品质、功能落地效果与施工推进效率。其核心目标可归纳为“把控设计质量、规范设计流程、落实设计意图”,

实操中可从主创设计师专业能力、团队人员配置、设计成果质控、施工样品管理四大维度重点落地。

结语:大型精装修工程项目管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以六大核心管控要素为基础框架,以技术路径与设计管理为核心支撑,搭建科学完善的全域管控体系,实现项目全流程管控、各要素协同联动。其中,设计管理作为项目品质管控的源头,其管控成效直接决定项目整体质量与综合效益,因此需重点抓实主创设计师能力把控、团队人员配置、设计成果质控、施工样品管理四大核心要点。在具体项目运营管理中,需结合项目个性化特点,灵活调整管控策略,优化管控流程,持续提升项目管理效能,有效应对各阶段各类风险,保障项目平稳落地,最终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

作者:张栋栋(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